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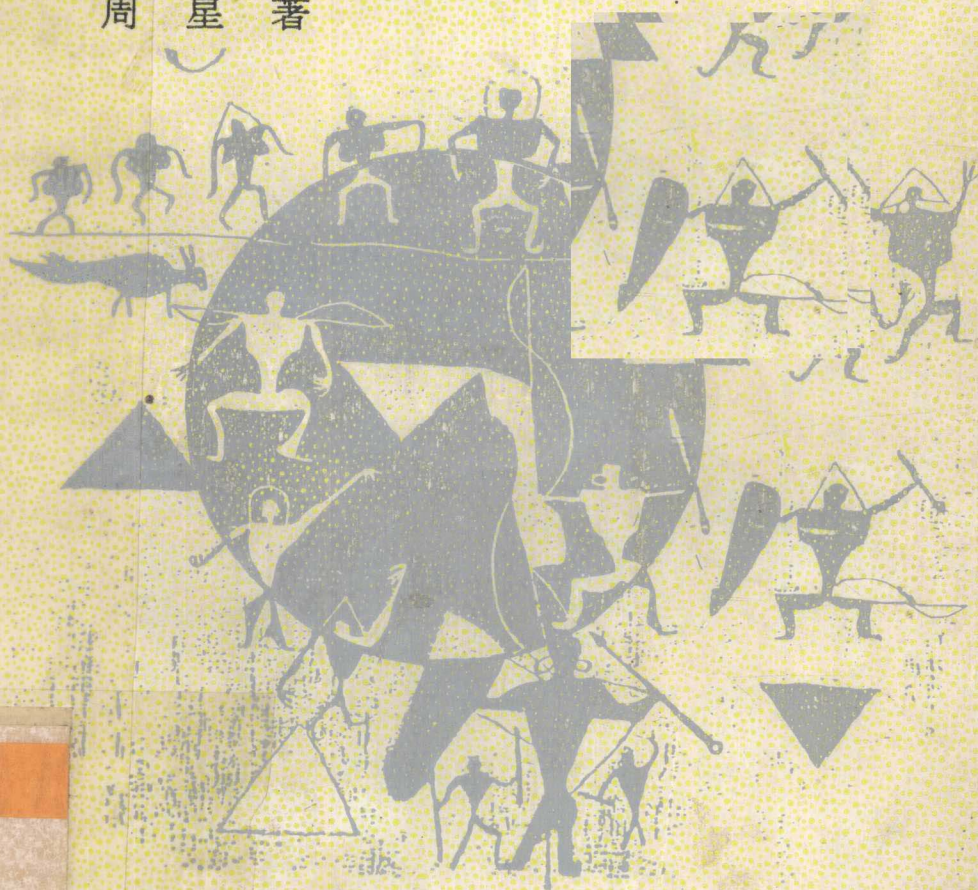
Prehistory and Archaeology

Zhou Xing



史前史与考古学

周星著



史前史与考古学

周 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8870070

史前史与考古学

周星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富平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插页 207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

ISBN 7-224-02064-8/K·290

定价：(精)6.00元 (平)4.00元



序

《史前史与考古学》是周星同志近多年来，在史前史和考古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和大胆探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很值得阅读的一本好书，我愿在此向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志们作一推荐。

周星同志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有突出成就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之一。我认识他是在1981年他报考尹达同志硕士研究生时开始的。尹达同志特别重视史学队伍的建设和一批研究生骨干的培训。在晚年，他摆脱繁重的行政工作之后，决定要招研究生亲自培育，目的是能有一批合格的理论干部，把经典作家开辟的科学道路，在史前史和考古学领域内继续发展下去。周星同志是他招收的第一批优秀的学生中的一个。周星同志当时是在西北大学报考的，尹达同志委托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组周自强同志专程到西北大学进行复试。周星同志的考试成绩很好，复试也顺利地通过，他的考卷和成绩很得尹达同志的赏识。录取后，就跟随尹达同志攻读史前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尹达同志因工作和身体原因，有关考古学方面的课程由我来辅导，这样，我与周星同志就有了更多的接触，并建立起较深的同道同志之谊。

周星同志在尹达同志指导下，在理论与方法上作了刻苦的学习与探索，为他后来的研究和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尹达同志很重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与运用。他在考古所、

历史所对青年同志都是这样要求的，对研究生要求得更严格，他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学习理论，掌握精神实质，用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大量史实作严肃的科学分析，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尹达同志在运用理论原理与具体科学实践方面，提倡综合研究，强调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联系，主张从考古学的理论高度，分析考古材料中所反映的复杂现象，以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并要求我们史前考古学者、民族学者、古史学者密切配合，从各个学科的角度，深入探索，使祖国有文字以前的社会历史面貌重现于世；从考古材料中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进一步探索社会发展规律，解决古文化发展的具体进程和古代史方面的某些关键性问题。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学习过程中，周星同志是一个合格的学生。他在《中国史前史的研究及其史料学与方法论》一文中，较全面、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这一原理，并运用于自己的学术实践中而获得很大成功。

1983年尹达同志逝世，古史方面由杨向奎和张政烺两位先辈指导，考古仍由我负责。

1985年，我参加了周星同志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他的论文获得成功，本书中的《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的住宅形式与聚落形态》，就是他的论文，当时参加答辩的有前述几位先辈，他的这篇论文，得到大家一致的赞许。从这篇论文中，也可看出他在综合研究方面表现出的理论功力和敏锐才思。

毕业后不久，他考上了杨堃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攻读民族学方面的博士课程。杨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民族学家、史前学家，对考古学研究十分重视，常常关怀《史前研究》及有关问题。在杨先生指导下，周星同志在民族学、人类学和考古

学诸方面,得到更广泛深入的接触和学习,视野更广阔了,业务基础更厚实了,在这期间,我与周星同志的联系更加密切,我们互相通讯,经常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並合作进行了一些研究。他的学术素养表现的更加成熟了。

周星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费孝通先生指导下作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从事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他的学术活动,远远超过了史前史和考古学的范围。但他认为史前史与考古学仍是他最感兴趣而有建树的领域。他多次谈到就史前中国文化与古典中国文明的关系作进一步深入探索的设想,这是有关我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重大课题,是大家所关注的。我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而我也相信他在这方面是能有所作为的。

周星是一个热忱、认真、勤学好思並且肯吃苦的青年。他的祖籍陕西丹凤县,是我们陕西最穷困的山区之一。现在他每年还要回故乡看看,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他自小就锻炼成一种勤劳耐苦、坚韧不拔、敢于摆脱困境、开拓奋进的性格和气质。在学术研究上,也体现了这种素质,他敏于思而善为文,能抓住问题关键而启隐发微,且常常富有见地。在1981年~1991年的短短十年间,先后发表了九十余篇(部)学术论文、译著和评论,其中约三十余篇左右是专门讨论史前史与考古学问题的。收入本书的十多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他在史前史与考古学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这里有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有具体历史问题的阐发,有重大历史课题的研究;还有对古史学家正在争论的问题的探索,其中有一两篇是我们两人合作的,那些学术观点自然是我所赞成的。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些文章的运笔运思主要是周星同志作的,我只是从旁协助而已,顶多在有关

考古学问题上提些见解。他发表的许多学术见解，都是有创见性的，其价值应该引起史前史和考古学界同志的注意。他在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值得学术界重视的观点，譬如：关于古代岩画与原始宗教之关系的讨论；关于政治生活之缘起的讨论；关于沧源岩画中村落向心布局的研究；关于女儿国的研究；关于营窟的研究；关于黄河上游史前遗存族属的推定等等，有些是很成功的研究成果；如对新石器时代住宅形式演变与聚落形态的讨论，尤其从中国史前聚落形态到城堡古典文明的分析，为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他全面充分地阐明了中国聚落形态发展的特点、历史及其意义，是至今讨论这一问题最成功而众所瞩目的一篇论著。它集考古文献与民族学资料于一体，对任何单一学科不能完全说明的问题，在综合研究中重现了历史真实。

周星同志步入科学研究领域，正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学术界的思想也较活跃。流行于世界学界的一些学术思潮，也影响到中国学术的一些领域，考古学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如新考古学概念、环境考古等等），特别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以解决人类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可能，这就影响到考古学进而与考古学相连系的古代史方面的深层次问题的探索和研究，这不仅需要理论指导，也需要方法的革新，才能达到目的。周星同志面对这种现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作了深刻的思考，对革新学科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如对民族考古学的理解；对考古学作为人类学范畴的规范（考古人类学）的看法；对考古学现状的某些评论与对未来趋势的分析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他不断思考，如何使人类历史科学向前发展而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并在实践中探索

·尝试的进取精神。

周星同志从考古经历史而到民族学的学习经历，在诸前辈的指导培育下，使他有可能从多学科的角度来考察史前史和考古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多年来我一直在鼓励他，像诸前辈期望的那样，希望他多思考一些理论与方法问题，多做一些综合性的研究工作，希望从他们这一辈青年同志开始，逐渐改变考古学缺乏理论与思想性的局限。周星同志是一个文艺与器识兼具的优秀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是能有所作为的。他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且确实实迈出了有意义的几步，希望他勇敢地沿着这条崎岖的道路不畏艰难地登上最高峰。

能为青年学者的文集写序，使我感到由衷地高兴，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科又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表现出我们事业兴旺发达；同时，青年学者的成长，意味着我们所热爱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是我们长一辈人所最热望的事。我还希望由于本书的出版能吸引更多的青年同志，投身于这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研究领域，因为中国原始社会历史问题及规律的探索与解决，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它的成果，不论对中国史或世界史的研究都是有贡献的。因此，我期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星”从这个园地里闪闪升起、灿灿发光，形成群星璀璨的光辉景象，那将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

石兴邦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于西安

Contents

Foreword

目 录

The Study of the Prehistory of China: Its Data and

- 序 石兴邦 (1)
- 中国史前史的研究及其史料学与方法论 (1)
- 最初的工具和人类历史的第一章 (31)
- 政治生活的缘起 (45)
- 中国古代岩画中所见的原始宗教 (60)
- 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的住宅形式与聚落形态 (75)
- 黄河上游史前遗存及其族属推定 (148)
- 丹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 (165)
- 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 (180)
- 考古人类学 (218)
- 民族考古学及其在中国的意义 (243)
- 考古学与民俗学 (261)
- 器物本位与聚落本位 (273)
- 中国考古学：困惑中的思考 (277)
- 后记 (297)

Shun and Yu Against Miao, the Barbarians

Archaeological Anthropology

Ethno-archaeology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a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

Contents

- Foreword
- The Study of the Prehistory of China; Its Data and
Methodology
- Earliest Tools and the First Chapter of Human
History
- The Origin of Political Life
- Primitive Religion Embodied in the Ancient Cliff
Paintings Around China
- The Neolithic Dwelling Style and Settlement Pattern
Along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 Prehistorical Remains along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Inferences of
Their Possessors
- The Neolithic Age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Danjiang River
- Preliminary Exposition on the Wars Staged by Yao,
Shun and Yu Against Miao, the Bar-
barians.
- Archaeological Anthropology
- Ethno-archaeology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a
- Archaeology and Folklore

Implemental Standard Versus Settlement Standard
Chinese Archaeology, Introspection in Perplexity
Postscript

Contents

Foreword
The Study of the Prehistory of China, Its Basis and
Methodology
Earliest Tools and the First Chapter of Human
History
The Origin of Political Life
Primitive Religion Embodied in the Ancient Cliff
Paintings Around China
The Neolithic Dwelling Style and Settlement Pattern
Along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Prehistorical Remains along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Inferences of
Their Possessors
The Neolithic Age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Danjiang River
Preliminary Exposition on the Wars Staged by Yao,
Shun and Yu Against Miao, the Bar-
barians
Archaeological Anthropology
Ethno-archaeology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a
Archaeology and Folklore

中国史前史的研究及其 史料学与方法论

原始社会史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少史学家那里被简单地、有时甚至是不负责任地一笔带过。但是，在中国它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无疑已经确立了在学术王国中的一席之地，并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所接受和承认。这门具有深厚历史背景和富于时代特色的学科还正在发展，它的成熟与进步，有待于有关的史料学与方法论的建设与完善。

原始社会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既富于理论性，又富于实践性的历史学科。说它古老，首先是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远的上古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原始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走向灭亡的规律；其次，就学科史本身而言，也具有悠久的历史，且不说各个民族都有关于自己史前历史的神话和传说，历史上也不乏那些对人类史前状态作出天才猜想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古代就有“上古之世”、“中古之世”之类的说法等；仅拿近代科学对于人类史前

时代使用的旧石器和新石器的逐步认定而言，就经历了整整几个世纪之久，而且这种认识还远远没有完结，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说它年轻，是因为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原始社会史毕竟是在19世纪以来的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近代科学的夹缝中逐渐确立的，它受到许多相关学科的滋润并脱胎于其间，因此，它同时富于多学科互相渗透的时代特色。说它富于理论性，首先是因为它研究没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原始状态，即原始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研究对象的科学性要求它不承认并拒绝所谓研究“人类的自然状态”的非历史观点；它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伴随着复杂的理论斗争；其次，还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起源的科学：劳动、语言、文字；科学、宗教、艺术；道德、法权；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等等。关于事物起源的研究，一般总能为对该事物的认识提供一些重要的解释，因此，原始社会史对于整个人类在认识论上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说它富于实践性，则是由于它的产生与进步总是有赖于具体的民族学与考古学的田野工作的进展，由此才得以实现它对于史料的开拓。

如同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一样，中国各族人民也都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原始社会史，则以中国历史上的史前状态——中国原始社会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自从人类最初诞生和活动在中国这块土地之上，一直到国家出现和富于永恒魅力的华夏古典文明形成的时候为止，这一段漫长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中国原始社会史的主要研究领域；由于一般以夏代作为中国国家形式和阶级社会的肇始，故中国原始社会史基本上便以此为终点。显而易见，一部

几百万年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相对于一部四、五千年的中国文明社会史而言，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它是中国通史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时间上占去了中国通史的绝大部分，而且在空间上作为曾经普遍存在过的社会形态，到处都给后来的历史进程留下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文化遗产并保持着它的持久的影响力。

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学科史则要更为年轻，它伴随着本世纪初西方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等日益东渐而逐步萌芽。一开始，它就与中国社会史问题大论战相联系。改造现实的中国必须首先认识历史的中国；而要认识历史的中国，则必须从中国历史的发源去开始探索；尤其是独具特征并影响到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其特点的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究竟具有哪些素质？这些素质又是怎样产生和形成？又是如何发展并最终走向灭亡？三代文明究竟继承了哪些史前的遗产？这些遗产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虽然当时尚未能如此明确地提出问题，但是，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却始终困扰着追求真理的青年学者们。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反映着中国传统史学的革命在所难免。一大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运用西方诸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试图重新解释和反省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正是基于这种时代的需要，中国原始社会史才在诸多学科的共同培育下，悄悄地然而是不可逆转地孕育并成长起来。

裴文中、贾兰坡等诸位先生关于北京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第一次揭示了中华民族远古文化那源远流长的先河时代，是中国近代科学第一次取得的使整个世界都为之瞩目的成就。以梁思永、尹达、夏鼐等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卓越的田野考古学家，对中国史前考古学（主要是新石器时代考古

学)的开拓与建设,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的考古学编年体系,从而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骨骼构架。在所有关于中国人文化与族源的十种学说中,竟有九种“外来说”为文化侵略张目的昏暗年代里,“仰韶”、“龙山”、“小屯”三迭文化层的发现,以及从史前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上对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廓清,不仅给当时的整个思想界带来了一缕清风,而且使中国原始社会的研究开始为世人瞩目。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富于反封建色彩的古史辨派,发聋振聩,辛勤耕耘,终于基本澄清了中国古史中“三皇五帝”大一统的虚构体系,并揭示了这一体系的具体“层累地”形成的过程;这不仅为传统史学带来一场震撼性的革命,而且也为中国上古史包括史前史拨去了一层层疑云迷雾,为日后建立全新可信的上古史体系,奠定了基础性的工作。摩尔根、泰勒、弗雷泽等许多西方学者著作的翻译出版,为中国当时的学术界带来了大量的外界信息。蔡和森、杨贤江等志士仁人,首先将恩格斯的经典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介绍到国内,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传播,不仅强烈地影响到当时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中国学术界,而且为后来民族学和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性的方向。郭沫若先生和吕振羽先生的开创性研究,是中国原始社会史方面最初的重大学术成果。蒙文通、徐旭生等先生对中国上古传说历史系统的重新梳理,为重建上古信史作了可贵的探索,并使得文献材料所反映的中国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林立的历史真相昭示于世。更为重要的是,日趋成熟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在建国以后迎来了迅猛发展的黄金时代,从而使三代文明所赖以发生的史前基础日益昭然炳彰:这种基础远远比历来所可能设想的要更为丰富、更为复

杂和更为深远博大，它与三代文明的承袭关系，也比历来所可能认识的要更为密切、更为直接和更为确定无疑。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一系列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使得通过史前考古学的途径去探索远古时代的社会性质以及探索以氏族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组织结构日益成为可能。早在建国前就已经开始，而在建国后才真正大规模开展起来的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揭示了直到不久以前还存在的约60万人口之众的中国若干少数民族中的原始社会或其残余形态，尤其是那些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并开始向阶级社会发展的过渡状态的民族志材料以及那些刚刚告别原始社会母体不久的早期文明社会，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有关原始社会尤其是中国原始社会的理解。

毋庸讳言，在以往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大量课题，常常是更多地分别包含在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和神话学等学科的范畴与领域之内，它并未能够从各有关学科的怀抱中完全独立出来，各学科的相互协调与结合研究还远远不够，在不少场合下，中国原始社会史还常常被与史前考古学相混同。但是，中国原始社会史毕竟渐次具备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具备了自己独特的史料来源和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论；中国原始社会史的许多重大课题已经或正在被不断地问津，并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兴趣与关注，在不少方面也已经成为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作出了可观的贡献，例如关于长江流域远古文化及其历史地位问题的研究等等。现在已经是基于实践的发展而必须在理论上承认并对此加以概括的时候了。当然，过高估计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水平与否认它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存在，都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中国原始社会史由于是在比较晚近的时候，从诸多学科之

中和彼此之间产生的，因此它具有某些边缘性学科、综合性学科与交叉性学科的特点，它的出现完全符合现代科学各部门分化与综合的历史趋势^①。亨利·伊雷内·马鲁说过：“（史前史）这不仅是一门边缘学科，而且还是复合性的（这种情况是常见的：一些特殊科学，没有逻辑的一致性，是一些属于实践范畴的实体）：从它的对象和方法来看，都是一门混合性学科。”^②正因为如此，它不拒绝借用任何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只要是有益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之区别于一部中国文明社会史，在于它们有各自不能互相替代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后者以历史文献记载为主要史料来源，而前者则是以从地下发掘出土的史前实物资料为主，同时也不排斥利用各种可能的文献资料、民族学资料以及其它有关资料。中国原始社会史与中国文明社会史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既存在某些共同的学科规律，又各自具有独到的性格。

中国原始社会史，在某种意义上，其性质近似于传统史学中的断代史，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它应从先秦史中独立出来；虽然，先秦史由于本学科的独特需要，它保留一些年代更为古老的研究领域也未尝不可。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正象我们不能将一部中国通史仅仅理解为汉民族的历史而排除古代的和现代的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一样，我们也不能将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史简单理解为仅在中原最发达的地区产生国家与文明社会

^① 杨希枚《当代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6期。

^②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